

资本权力与族群政治： 南非国家俘获的形成逻辑

——以祖马时期的古普塔家族为案例研究^{*}

朱鹏飞 杨崇圣^{**}

摘要：“国家俘获”是新兴民主国家普遍面临的一种转型困境，其本质是资本权力对国家权力的绑架与操控，属于腐败的高级形态。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同样遭遇了“国家俘获”这一困境。由于殖民历史和种族隔离制度的影响，南非的案例充满了族群政治色彩。“资本权力”和“族群政治”纠缠在一起，使得后殖民国家遭遇“国家俘获”的情形变得更为复杂。本文将对南非的“国家俘获”现象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对古普塔家族和宗多委员会的深入分析，试图探索后殖民语境下“国家俘获”的形成机制和解决方案。希望借助南非的个案为“国家俘获”提供理论上的补充与完善，并尝试与更为宏大的“弱国家困境”理论形成对话，以此反思后殖民国家的民主化与国家建构道路。

关键词：南非；国家俘获；资本权力；古普塔家族；宗多委员会

^{*}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项目编号：留金选[2021]70）阶段性成果。

^{**} 朱鹏飞，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开普敦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者；杨崇圣，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自 1994 年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以来,实现了和平民主转型的新南非在国家建构过程中依然面临诸多困难和考验。其中,腐败问题是困扰南非政治良性发展的一大障碍。根据国际反贪腐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最新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数/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①显示,2021 年度南非的清廉指数为 44 分,在全球 180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70 位。年度横向比较而言,该年度廉洁度最高的国家分别是丹麦、芬兰和新西兰,CPI 指数均为 88 分;廉洁度最低的国家是南苏丹,CPI 指数为 11 分。^②从时间维度的纵向比较来看,南非的 CPI 指数从 1995 年至 2021 年总体上呈下跌趋势,其数值在 1996 年增长至 57 分以后便开始持续走低,最低值曾经达到 41 分。^③而在南非国内各个省份中,腐败程度最高的为豪登省,最新报告显示其腐败比重在全国占 45%,紧随其后的是夸祖鲁-纳塔尔省和西开普省,腐败比重均为 10%。在众多腐败类型中,行政腐败、采购腐败和权力滥用是腐败程度最高的三种类型。^④

南非目前的腐败不仅呈现出广泛性和系统性的特点,而且这种腐败由来已久,深入体制。根据 2021 年的一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腐败问题被认为是南非面临的第二大顽疾,仅次于失业问题。^⑤在笔者

① 清廉指数(CPI)采用百分制:100分表示最廉洁;0分表示最腐败;80—100分表示比较廉洁;50—80分表示轻微腐败;25—50分表示腐败比较严重;0—25分则表示极端腐败。

② 数据来源: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 2021, <https://transparency.org/en/cpi/2021>。

③ Marius Roodt, “Free Facts: Corruption Eats at South Africa’s Foundations”,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 (IRR), No. 10, Issue 30, 2020, <https://irr.org.za/reports/freefacts/files/00-2014-freefacts-2014-october-2020-draft-20-11-2020.pdf>。

④ “The most common types of corruption in South Africa”, BusinessTech, Apr 1, 2022, <https://businesstech.co.za/news/government/573484/the-most-common-types-of-corruption-in-south-africa/>。

⑤ “Summary of Results: Afrobarometer Round 8 Survey in South Africa, 2021”, Compiled by: Plus 94 Research, https://www.afrobarometer.org/wp-content/uploads/2022/02/summary_of_results-south_africa_r8_26nov21.pdf。

2016年和2021年两次赴南非进行田野调查的实地访谈中，当地人的故事里既有行政部门腐败的奇闻，也有司法部门腐败的轶事。^①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至南非以后，腐败现象在公共卫生部门愈加严重，媒体中关于商人和政客置国家灾难状态于不顾，互相勾结，趁机敛财的新闻报道层出不穷。然而，在诸多腐败现象中，最引人注目且对南非影响至深的则是近年来关于前总统祖马（Jacob Zuma）与印度富商古普塔家族（Gupta Family）之间的一系列腐败活动，其腐败形式已经超越了行政和司法的层面，上升到了影响和控制立法的层面，南非媒体和学界称之为“国家俘获”（State Capture）。

本文将针对南非的“国家俘获”现象做认真的理论梳理和个案研究。通过南非的个案分析，试图为转型国家普遍遭遇“俘获”困境做出理论上的回应，同时揭示后殖民地时期的新兴民主国家在遭遇“国家俘获”时呈现出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最终，希望借鉴南非宗多委员会的案例为其他国家解决“国家俘获”这一难题提供经验参考。

一、国家俘获：理论回顾与南非案例

“国家俘获”在学术界成为热词始于乔尔·赫尔曼（Joel S. Hellman）等人在2000年发表的一份世界银行政策报告，用以描绘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俘获经济”（Capture Economy）困境。该报告的封面寄语这样写道：“在十年的转型中，对利维坦国家（Leviathan state）的恐惧正在让位于对‘俘获国家’的寡头的关注。在俘获经济中，政策和法律环境被形塑为俘获者

① 作者先后两次赴南非开普敦进行田野调查，时间分别为2016年9月至2017年8月和2021年12月至今（本文刊载时）。

公司的巨大优势，却牺牲了其他企业部门的利益；这对政策有很大的影响。”^① 赫尔曼等人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转型过程中的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认为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使政企关系滑向了另一个极端，经济发展的困境已经从“国家影响企业”转变为“企业影响国家”，即从“强国家”困境转变为了“弱国家”困境。在被称为“俘获经济”的现象中，国家俘获、行政腐败和企业影响力是最主要的三种表现形式，而“国家俘获”则被认为是最严重的一种形式。根据赫尔曼等人的定义，国家俘获是指企业向公共官员进行非法的和不透明的私人支付，以期影响国家机构的法律、规则、规章或者法令的制定。^② 与一般的行政腐败不同，“国家俘获”直接从法律和政策制定的源头施加影响，具有更强的隐秘性和危害性，因此，一些学者也将其称之为腐败的高级形态。

国家俘获理论自赫尔曼等人提出以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并在学术界引发了激烈讨论。学者们纷纷采用这一理论分析不同转轨国家的腐败现象，研究案例也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扩展到了拉美、非洲乃至美国。“国家俘获”一词在不同的案例使用中也被赋予了新的义涵，从俘获关系中的主体来看：俘获者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企业这一视角，精英、寡头、家族、黑帮教父都被纳入到“俘获模型”之中；被俘获者不仅包含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还引申至政党和具体的政客处。具体的研究案例如：米歇尔·克里马（Michal Klíma）教授以“非正式政治”的视角对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的国家俘获和政党俘获现象进行了研究，并且用“庇护主义”（Clientelism）这一概念把企

① Joel S. Hellman, Geraint Jones & Daniel Kaufmann, *Seize the State, Seize the Day: State Capture, Corruption, and Influence in Transition*,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444, Washington D.C., 2000.

② Joel S. Hellman, Geraint Jones & Daniel Kaufmann, *Seize the State, Seize the Day: State Capture, Corruption, and Influence in Transition*,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444, Washington D.C., 2000.

业、政党和国家三者进行了有机联结，重新绘制了一套完整的“国家俘获”模型。^① 约翰·克拉布特里（John Crabtree）教授对秘鲁的研究揭示了精英们用来主导政治讨论和排挤对手的机制，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投资者等外部角色所发挥的作用，阐明了为何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却往往苦苦挣扎于实现真实的民主。^② 亚历山大（Alexander Hertel-Fernandez）教授分析了美国的保守主义活动家、巨商和财富捐赠人如何通过“右翼的三驾马车”来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进行俘获。^③ 中国学者对该理论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层面或是在具体行业领域做案例分析，如邢成举^④ 和刘升^⑤ 等人对中国乡村扶贫政策中的精英俘获现象的研究；郭启光对中国煤矿安全规制的俘获研究^⑥。

总体上看，“国家俘获”现象在全球范围内的产生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和政治上的右翼势力普遍抬头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这一现象在转型国家的发生频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究其原因，主要是转型国家在转型之初往往在政治上比较羸弱，在新自由主义的游戏规则下更容易被资本的力量所俘获。在以往的国家建构和民主化理论体系中，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主要是围绕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两个维度进行展开，对资本权力的忽视无疑是国家

① Michal Klíma, *Informal Politic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Political Parties, Clientelism and State Cap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 27.

② John Crabtree & Francisco Durand, *Peru: Elite Power and Political Capture*, London: Zed Books, 2017.

③ Alexander Hertel-Fernandez, *State Capture: How Conservative Activists, Big Businesses, and Wealthy Donors Reshaped the American States—and the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④ 邢成举：《乡村扶贫资源分配中的精英俘获——制度、权力与社会结构的视角》，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

⑤ 刘升：《精英俘获与扶贫资源资本化研究——基于河北南村的个案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5 期，第 25—30、137—138 页。

⑥ 郭启光：《中国煤矿安全规制俘获研究：形成机理、双重影响与治理效果》，东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年。

建构理论的结构性遗漏。“国家俘获”的理论和案例让我们看到，尤其是在转型国家，资本权力已经成为与国家并驾齐驱的另一种形式的“利维坦”。对此，左翼学者曾毅教授指出，资本权力是理解国家建构不可或缺的结构变量，国家建构理论应该从“国家权力-社会权力”的二维分析模型转变为“国家权力-资本权力-社会权力”的三维分析模型。^①

南非的“国家俘获”案例与其他转轨国家相比，既具有资本“利维坦”的一般性特征，又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由于殖民历史和种族隔离制度的深刻影响，南非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遭遇的“国家俘获”呈现出更为鲜明的族群政治特征。在以往的研究案例和分析模型中，学者们往往只关注俘获者和被俘获者之间既定的“资本-政治”关系，却很少分析政治转型和资本流动的动态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与之相捆绑的族群身份问题。对于南非而言，为何印度家族能够在后种族隔离时代迅速崛起，并成功俘获祖马政府？相对于殖民时期的白人老爷，后殖民时期的新兴权贵又具有哪些身份政治的特性？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探究南非案例的独特性，也有助于对“国家俘获”概念进行理论上的补充与回应。

二、政治转型与资本流动： 后种族隔离时代的新兴权贵

从政治转型的视角来看，如果说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变被视为驯化“利维坦”的过程，那么“国家俘获”则以资本权力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民主化进程中另一种“利维坦”的诞生。在经济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体制的大背景下，资本权力显然比国家权力更加难以驯

① 曾毅：《现代国家建构理论：从二维到三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161—169页。

服。卡尔·波兰尼曾在《大转型》中用“脱嵌”（disembedding）的概念描述市场自由主义带来的政治经济后果，市场机制的全球化效应造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活动逐渐从政治和社会框架中脱离出来，并逐渐开始反作用于现存的政治与社会结构。^①当下，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脱嵌”这一概念更有利于我们理解资本权力对民族国家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面对国家政治转型的危急时刻时，资本具有更强的逃逸性和流动性。凭借全球化的经济网络，资本可以在感知到危机时迅速逃离，也可以在嗅到商机时迅速流入，大展拳脚。这一现象在南非1994年前后的民主转型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从种族隔离到后种族隔离的过渡，表面上看是从威权到民主的和平转型，实际上则更像是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的重新洗牌。

南非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殖民统治和残酷的种族隔离制度。回看南非的历史，荷兰人和英国人在此进行的权力角逐与殖民地开发，背后无不与资本的驱动有关。荷兰人凭借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在两洋航线上的重要地位，使其海外故乡从一个海港补给站迅速扩展为酒庄与农场林立的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②钻石与黄金等矿产的发现不仅促使英国人与布尔人兵戎相见，而且成就了英裔白人对南非矿业和金融的长期垄断。^③整个殖民时期，白人殖民者始终是南非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持有者。到了种族隔离时期，以阿非利卡人（Afrikaners）为基础的国家党（National Party, NP）更是以法律化和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了白人群体的种种特权，并且把非白人群体按照肤色深浅进行了政治等级划分。长期的殖民统治和种族隔离制度形成了南非白人对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垄断局面，与之相伴随的是社会结构和

①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 Carolyn Hamilton, Bernard K. Mbenga & Robert Ros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Volume 1, From Early Time to 188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98-210.

③ Martin Meredith, *Diamonds, Gold, and War: The British, the Boers, and the Making of South Afric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8.

族群关系的严重失衡。随着种族隔离后期黑人民族主义运动的不断高涨以及国际社会对南非的封锁与制裁，白人种族主义的威权统治已无力维系。1990年曼德拉从狱中获释，南非进入政治转型前夜的关键时刻。黑人对于即将掌握国家权力兴奋呐喊，白人则普遍陷入唯恐财富丢失的忧虑与彷徨之中。出于对政治转型前景的担忧，许多白人选择在黑人掌权的前夕转移资本甚至离开南非。

关于南非的政治转型，学术界普遍习惯于把1994年作为时间转折点进行分析。然而，开普敦大学人类学教授菲奥娜·罗斯（Fiona Ross）认为，“关于南非的政治转型，我们更应该关注1990年至1994年这段历史。因为1994年之后的南非，所有的政治设计和制度方案都已经出炉，各方力量的谈判结果也已经确定，而1994年之后推出的所有政策和道路选择都是出于之前的那段秘密谈判时期。今天南非所有的成就和大部分问题都源自那段时期”。^①斯泰伦博什大学已故经济学教授泰列伯兰奇（Sampie Terreblanche）更是认为，南非民主转型的真正拐点应该是1986年，这一年南非不仅在国内迎来了反种族隔离斗争的最高潮，国家宣布进入全面紧急状态；在国际层面也遭遇了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的全面封锁与严厉制裁。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撤资运动达到了南非无法承受的临界点，资本净流出的急剧上升，导致南非工商业部门的严重危机，进而带来了更为剧烈的社会动荡和黑人工会的罢工运动，种族隔离政权已经无法维系，必须废除。^②

无论学界对于南非政治转型时间起点的争论如何，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剧烈的政治转型带来了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如果说，1986年的政治危机造成的主要后果是外国资本的迅速抽离，那么，1990年

① 资料源于笔者2022年3月22日10:30—12:30（当地时间）在开普敦大学人类学系对Fiona Ross教授的访谈。

② S.J. 泰列伯兰奇：《迷失在转型中：1986年以来南非的求索之路》，董志雄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

释放曼德拉的政治信号则引起了大量本国白人资本的转移和逃逸。笔者曾就转型前夜的政治氛围对当地不同族群身份的亲历者进行了一系列访谈。一位在南非生活了 42 年的台湾老侨石先生向笔者讲述：

当时曼德拉从罗本岛释放后，南非的黑人都沸腾了。我还记得在我家长期做工的一个佣人有一天突然对我说，“你知道吗？马迪巴（曼德拉）出狱了，他一定会当上总统的！到时候这所房子就是我的了！”你可以想象我当时听到这些话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害怕，有钱人都买了枪用作防卫，因为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很多人当时出于安全考虑都离开南非了。^①

一位目前生活在开普敦的白人企业主也曾告诉笔者：

我有两个哥哥，他们当时都选择了离开南非，只有我自己选择了留下。因为他们担心南非会出现像津巴布韦一样驱逐白人的情况，加上我们家族早期是从津巴布韦迁到南非的白人家庭，所以对当时的政治转型很敏感。但是我留下来目睹了南非的整个转型，情况并没有像津巴布韦那么糟糕。南非的民主化很成功，如果政府能够解决腐败和失业这些问题的话，南非会成为一个很伟大的国家！^②

一位至今仍生活在贫民窟里的科萨族妇女玛西（Masi）这样回忆并评价南非的民主转型：

① 资料源于笔者 2022 年 1 月 21 日 18:00—21:00（当地时间）在开普敦 Milnerton 一家中餐馆对石先生的访谈。

② 资料源于笔者 2022 年 5 月 31 日 19:00—22:00（当地时间）在开普敦 Pinelands 一位白人朋友家庭晚宴上的访谈。

1990年曼德拉出狱后，南非的政治环境开始宽松了，我的丈夫就是那一年从西非的马里来到南非的。1991年我们相识，但是6年前他死于一场疾病。1994年刚刚结束种族隔离的时候我们都很兴奋，但是我的父亲那时就告诉我们不要高兴的太早，我们的处境不会有什么变化。现在觉得父亲当年的预感一点没错，种族隔离结束二十多年了，但我们的生活处境并没有任何改善，唯一的变化仅仅是政治上拥有了投票权，但经济上依然没有变化。^①

玛西的处境道出了南非民主转型过程中的最大痛点，也暴露了后种族隔离时代依然严峻的经济与社会区隔。尽管1994年新南非成立后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改善广大黑人经济生活的法令及措施，但是由于腐败和裙带主义的影响，黑人经济振兴计划并没有真正惠及底层大众，而是被少数新兴权贵劫持。因此，南非的民主化并没有带来社会结构方面的根本改变，只是改变了精英阶层内部的族群比例。白人精英退出政治舞台专心于自己的经济领域，黑人政客及其裙带资本成为新兴的统治集团。许多南非人称他们生活在一个“卡布奇诺”社会：底部是黑色的咖啡，上层是白色的泡沫，最顶部则是一小撮装饰用的黑褐色可可粉。

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以后，出于对本国白人资本大量外流的担忧以及渴望重新融入全球经济，南非半自愿半被迫地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选择了新自由主义道路。^② 政治与经济上的开放吸引了国外资本和商人再次把目光投向南非，出现了资本的再次涌入。古普塔家族正是在这种政治转型和资本流动的大背景下来到南非，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成为后种族隔离时代的新兴权贵。

① 资料源于笔者2022年4月22日9:00—12:00（当地时间）在开普敦 Observatory 一个贫民窟里对 Masi 的访谈。

②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页。

三、古普塔家族的资本权力与商业帝国

古普塔家族之所以选择投资南非并且能够顺利打开局面，一方面是由于南非在转型中重新选择了经济自由化道路；另一个原因是印度裔本身就是南非的一个重要族群，不仅历史上有着长期的经商传统，而且政治身份在种族隔离结束后也有所提升。印度裔的族群身份为古普塔家族在南非的事业发展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在整个非洲的外来移民历史上，穆斯林商人自古以来就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大多数都市中心，非非洲人实际上垄断了零售贸易。在西海岸，垄断者是黎凡特人小店主，在东海岸则为印度人。^①印度人在非洲东海岸的贸易记录最早见诸《厄立特里亚海航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该书写作于公元1世纪，根据此书的记载或可推论，印巴商人早在古巴比伦时期就已经穿越印度洋在非洲东海岸经营贸易，并且建立了贸易站。南非是非洲印度裔人口最多的地方，大约有130万人，主要集中在德班，因此德班也被称为“印度以外最大的印度城市”。^②第一批定居南非的印度人是英属殖民地时期的奴隶和契约劳工，他们在纳塔尔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做家政和农业工人。后来，加入了“自由”移民，他们主要是来自古吉拉特(Gujarat)的商人群体。圣雄甘地就曾在南非生活21年。1893年，24岁的甘地来到南非，专为比勒陀利亚的穆斯林印度商人担任法律代表。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以后，又促使一批印度商人将目光投向南非，其中就包括古普塔家族。

①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等：《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任晓晋、褚建国、宋腊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6页。

② “15 facts about the Indian diaspora in Africa”，World Economic Forum, June 25, 2015,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5/06/15-facts-about-the-indian-diaspora-in-africa/>.

古普塔家族来自印度北方邦 (Uttar Pradesh) 的萨哈兰普尔市 (Saharanpur), 该市距离印度首都新德里以北大约 200 公里, 拥有大约 70 万居民。该城市的经济严重依赖农业、工业和森林业, 正是在这里, 希夫·库玛尔·古普塔 (Shiv Kumar Gupta) 开创了自己的采购生意, 并为自己三个儿子阿贾伊 (Ajay)、阿图尔 (Atul) 和拉杰什 (Rajesh) 的早期海外投资提供了资本。^① 古普塔家族早期曾在中国和新加坡尝试海外投资, 但是均以失败告终。在南非种族隔离即将结束时, 老古普塔看中了南非的投资商机, 并让二儿子阿图尔到南非投资兴业。阿图尔于 1993 年到达南非, 当时年仅 23 岁, 到南非不久后老古普塔便去世, 阿图尔凭借电脑和 IT 行业方面的优势很快在南非站稳脚跟, 并且创立了自己的品牌——“撒哈拉电脑” (Sahara Computers)。随后, 弟弟拉杰什和哥哥阿贾伊分别于 1997 年和 2003 年定居南非, 协助开展家族生意。^② 为了把家族生意在南非做得更大, 古普塔家族一开始便努力与执政党非国大 (Africa National Congress, ANC) 的高层政治人物“结交朋友”。在 1997 年祖马被选为 ANC 党内副主席时, 古普塔兄弟就已经把目光投在了他身上, 并于千禧年初与祖马建立了亲密的联系; 不仅在政治上对祖马提供财力支持, 而且还为祖马的孩子们提供上学的费用等。虽然在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祖马, 因为人们不认为一名祖鲁人能够在科萨人主导的 ANC 中胜出。^③ 但是, 在古普塔家族的财力支持下, 祖马的权力地位迅速攀升, 并最终在 ANC 的党内派系斗争中脱颖而出, 于 2009 年正式当选国家总统。借助祖马的“政治庇护”, 古普塔家族在南非的事业逐渐扩展至板球、报纸、电视、煤炭、核能和矿产等领域。

① Pieter-Louis Myburgh, *The Republic of Gupta: A Story of State Capture*, South Africa: Penguin Books, 2017, p. 19.

② Pieter-Louis Myburgh, *The Republic of Gupta: A Story of State Capture*, South Africa: Penguin Books, 2017, pp. 21-24.

③ Pieter-Louis Myburgh, *The Republic of Gupta: A Story of State Capture*, South Africa: Penguin Books, 2017, p. 27.

表 1 古普塔家族在南非的投资事业

投资领域	企业名称
电脑行业	撒哈拉电脑公司 (Sahara Computers)
	撒哈拉系统有限公司 (Sahara Systems Pty Ltd)
矿业	奥克湾资源与能源 (Oakbay Resources and Energy)
	西瓦铀矿 (Shiva Uranium Mine)
	特格达勘探与资源 (Tegeta Exploration and Resources)
	西下投资公司 (Westdown Investments Pty Ltd)
	JIC 采矿服务 (JIC Mining Services)
	黑边勘探 (Black Edge Exploration)
媒体行业	TNA 媒体 (TNA Media Pty Ltd)
	《新时代》报业 (The New Age)
	24 小时新闻电视台 ANN7 (Africa News Network 7)
娱乐行业	南非板球 (Cricket South Africa, 简称 CSA)
	投资的板球赛场：开普敦的 Newlands、伊丽莎白港的 St. George's Park、德班的 Kingsmead Stadium
其他行业	军用钢材生产商 VR 激光服务 (VR Laser Services)
	岛址投资 180 (Islandsite Investment 180)
	信心概念 (Confident Concepts)

实际上，在移居南非之前，古普塔家族在其印度家乡就已经深谙“政治投资”的商业逻辑。印度的北方邦曾因腐败问题而臭名昭著。政治职位通常由黑帮分子担任，商业活动经常通过黑帮网络和政治关系交叉进行。为了遏制这种极端政治安排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政治精英依然按照种姓身份进行划分，并且往往支持专制和暴力形式的极右民粹主义。其目的是让工人阶层和穷人反对脆弱的少数族裔，特别是穆斯林群体；而不是反对具有犯罪性和掠夺性的政治阶层。于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超级资本主义 (hypercapitalism) 得以繁荣，而理

性、进步和民主的社会团结变得日益困难。^①北方邦的政商环境一方面塑造了古普塔家族善于利用非正规渠道建立政治关系网络的商业思维,另一方面也说明新兴民主国家普遍存在的“非现代性民主”困境。在民主不够成熟的转型国家,家族、种姓、族群、宗教等传统性因素都有可能在民主的幌子下发挥实际的政治作用。在印度,主导政坛的非现代性因素可能是种姓,而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对现代政治影响最深的传统因素则是族群与部落。古普塔家族的资本权力正是在这种传统与现代混合交织的社会中产生与壮大,并最终在南非大展拳脚。

古普塔家族对南非政治的俘获除了对祖马进行“投资”以外,还试图对内阁成员以及国有企业部门进行渗透。2016年,随着当时南非公共保护专员图利·马东塞拉(Thuli Madonsela)的一份《国家俘获报告》面世,^②一系列有关古普塔家族影响内阁人事安排的指控相继浮出水面。前非国大国会议员菲琪·孟特尔(Vytjie Mentor)声称,2010年古普塔家族曾向她询问担任国营事业部部长的兴趣,作为交换条件,古普塔家族希望由其家族所拥有的捷特航空(Jet Airways)取代南非航空在印度航线的运营,但遭到孟特尔的回绝。^③财政部副部长麦克比西·卓纳斯(Mcebisi Jonas)承认,在2015年原财政部长恩兰赫拉·奈内(Nhlanhla Nene)遭祖马总统闪电撤换前不久,古普塔家族曾向其询问对财政部长职位的兴趣,但是遭到婉拒。^④根据南非《周

① Haroon Bhorat et al., “Betrayal of the Promise: How South Africa is Being Stolen”, State Capacity Research Project, Convenor: Mark Swilling, May 25, 2017, p22, <http://pari.org.za/wp-content/uploads/2017/05/Betrayal-of-the-Promise-25052017.pdf>.

② Public Protector South Africa, “State of Capture”, October 14, 2016, <http://cdn.24.co.za/files/Cms/General/d/4666/3f63a8b78d2b495d88f10ed060997f76.pdf>.

③ Kgothatso Madisa, “I Have Proof Zuma was in that Gupta with me”, *Sowetan Live*, March 17, 2016, <https://www.sowetanlive.co.za/news/2016-03-17-i-have-proof-zuma-was-in-that-gupta-house-with-me-mentor/>.

④ TMG Digital, “Full Statement by Deputy Finance Minister Mcebisi Jonas on Gupta Job Offer”, *Sowetan Live*, March 16, 2016, <https://www.sowetanlive.co.za/news/2016-03-16-full-statement-by-deputy-finance-minister-mcebisi-jonas-on-gupta-job-offer/>.

日时报》(*Sunday Times*) 报道，矿业部长莫泽本齐·兹瓦尼 (Mosebenzi Zwane) 和时任合作治理和传统事务部长德斯·范·鲁彦 (Des van Rooyen) 曾在迪拜与古普塔家族的成员密谈。鲁彦曾接替奈内当了 4 天财政部长，兹瓦尼曾帮助古普塔家族取得了一座大型煤矿的所有权。^①2017 年 5 月底，古普塔家族的邮件泄露，直接曝光了古普塔家族透过祖马总统及其党羽插手内阁人事安排的内幕，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包括任命亲古普塔人士担任国有电力公司艾斯康 (Eskom)、国有运输公司川斯奈特 (Transnet) 等国营企业的负责人，以及任命兹瓦尼担任矿产资源部部长。^② 古普塔家族的商业势力和对南非政坛的渗透已经达到了能够直接影响和操控南非公共政策制定的程度，是南非政治走向腐败的幕后推手；祖马时期的诸多腐败行为和荒诞现象背后都与古普塔家族的商业利益密切相关。

四、祖马时期的族群政治与国家俘获

南非的国家俘获一方面来自古普塔家族的资本权力，这是形成国家俘获的力量源头和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资本权力若想成功俘获国家权力必须借助一定的非正式政治渠道，这种非正式政治在南非更多表现为族群政治和部落效忠。可以说，祖马时期的族群政治和效忠文化是构成国家俘获的必要条件。

由于殖民统治时期英国人长期实行的“分而治之”传统和种族隔离时期的班图斯坦制度，导致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尤其是班图人社会中依然保留着较多的族群文化和部落习俗。在南非众多的班图

① Thanduxolo Jika & Qaanitah Hunter, “Gupta ministers’ in secret trip to Dubai”, *Sunday Times*, April 10, 2016, <https://www.timeslive.co.za/sunday-times/news/2016-04-10-gupta-ministers-in-secret-trips-to-dubai/>.

② Staff Reporter, “Here They are: The Emails that Prove the Guptas Run South Africa”, *Sunday Times*, May 28, 2017, <https://www.timeslive.co.za/sunday-times/news/2017-05-28-here-they-are-the-emails-that-prove-the-guptas-run-south-africa/>.

人族群与部落中，祖鲁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向来都是最强的。在祖鲁人的历史中，不仅有沙卡国王（King Shaka）的英雄象征和血河战役（Battle of Blood River）等史诗故事，而且在民主转型之初，成立于夸祖鲁-纳塔尔省以祖鲁人为基础的因卡塔自由党（Inkatha Freedom Party, IFP）曾经一度是与非国大（ANC）和国家党（NP）分庭抗礼的第三大党。1994年非国大成为国家执政党之后，相比于科萨人，祖鲁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依然较为强烈。因此，出生在夸祖鲁-纳塔尔省的祖马在其执政生涯中经常利用自己的祖鲁人身份进行个人的权力建构。这不仅表现为祖马在政府部门和非国大党内大力提拔祖鲁人，而且还表现为他经常以总统的身份返回家乡，利用部落习俗和仪式展演来塑造自己在本族群中的权威。根据南非自由州大学一些学者的研究，在过去二十年时间里，非国大内部的成员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有两个主要因素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方面，由于吸收了因卡塔自由党的大部分城郊支持者，非国大内部的族群性越来越植根于夸祖鲁-纳塔尔省。另一方面，祖鲁人在非国大会议上构成了最大的投票集团，而且占据了祖马内阁的关键部门。^①从祖马组建内阁的人事任命中可以看到，政治忠诚已经超越业务能力成为政治人物入阁的首要标准。^②其目的是维护和巩固祖马集团的私人权力，其危害则触及国家的公共利益和社会的良性运转，是导致权力滥用的腐败根源。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祖马对财政部长的频繁更换。

以笔者在南非进行田野调查期间发生的一次财政部长更换风波为例，2017年3月30日，祖马以“莫须有”的方式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将备受敬重的时任财政部长普拉文·戈登（Pravin Gordhan）革职，改

① Michaela Elsbeth Martin & Hussein Solomon, "Understanding the Phenomenon of 'State Capture' in South Africa", *Southern African Peace and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1, 2016, p. 27.

② Michaela Elsbeth Martin & Hussein Solomon, "Understanding the Phenomenon of 'State Capture' in South Africa", *Southern African Peace and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1, 2016, pp. 24-26.

由无任何财政与商业经验的 45 岁的马鲁西·吉加巴（Malusi Gigaba）接任。^① 此举不仅在南非国大党内乃至全国掀起轩然大波，而且重创南非经济，国家信用评级在国际上降至“垃圾级”（junk status），货币兰特应声暴跌。2017 年 4 月 7 日爆发了全国性的反祖马抗议游行，各大城市市民纷纷走上街头要求其下台。以开普敦为例，当日从南郊兰德博什（Rondebosch）通往市中心的主路上，游行队伍举牌高呼“必须驱逐祖马”“必须消除腐败”等口号。^② 然而，这已经是自 2015 年以来祖马第三次开除财政部长。2015 年 2 月，祖马宣布辞退时任财政部长奈内，起用不知名的党内同袍鲁彦，导致南非股市震荡，兰特跌破历史新低；此状迫使祖马改以戈登替换上任不到 4 天的鲁彦。^③ 对于祖马频繁更换财政部长一事，一位在开普敦从事了 20 多年金融工作的白人朋友这样说道：

南非的金融业是很成熟的，与世界接轨程度比较高。但是我们的政治太腐败了，尤其是前总统祖马和那个印度人家族把南非搞得腐败不堪！你能想象祖马曾经在一周之内更换了三个财政部长吗？当时我们简直都崩溃了。要知道，我们做金融行业的人可不关心谁当总统，但是财政部长一职由谁担任对我们来说则非常重要。^④

祖马之所以频繁更换财政部长，是因为其所提出的经济议案经常

① Norimitsu Onishi & Sewell Chan, “Firing of South Africa’s Finance Minister Widens a Political Rift”,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31,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3/31/world/africa/south-africa-pravin-gordhan-jacob-zuma.html>.

② 资料来自笔者 2017 年 4 月 7 日 9:00—10:00（当地时间）在开普敦 Rondebosch 街头的参与观察。

③ Norimitsu Onishi, “Jacob Zuma Appoints Third Finance Minister of South Africa in a Week”,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4, 2015, <https://www.nytimes.com/2015/12/15/world/africa/david-van-rooyen-south-africa-finance-minister-pravin-gordhan.html>.

④ 资料源于笔者 2022 年 3 月 13 日 18:30—20:30 在开普敦 Newlands 对一位当地白人金融高管的访谈。

遭到财政部长的反对。2017年3月底，祖马对戈登的罢免便是由于后者一直反对其提出的修建核能发电站的议案，以及反对政府将国库券向国内巨商开放竞标。^①据当时的媒体报道，3月27日戈登正在英国进行国际访问以吸引国际投资并增进贸易交往，却被祖马匆忙召回，并很快遭到革职。其背后的原因是，戈登的行为触及了与祖马关系甚笃的古普塔兄弟的家族利益。^②据悉，2015年祖马对财政部长奈内的罢免同样与后者反对国库券竞标以及反对核电站的修建等事宜有关。面对祖马和俄罗斯之间预计耗资8000亿至16000万亿兰特兴建核电站的计划，前财政部长奈内曾公开批评此举无异于“国家自杀”，因为在当时国内经济增长率低于2%，失业率高达27%的情况下，修建核电站是毫无意义的。^③几乎承担着全南非供电且仍旧依靠燃煤发电的国家电力公司艾斯康表示，相对于可再生能源，公司更倾向于使用核能。而反对党经济自由斗士（Economic Freedom Fighters, EFF）则指控说，这其实是祖马总统和古普塔家族之间一项充满腐败性质的核交易。因为古普塔家族旗下的一家品牌公司奥克湾（Oakbay）拥有着这个国家专门用于提炼铀的唯一矿藏，而祖马的儿子杜杜扎尼·祖马（Duduzane Zuma）直到2016年为止一直在这家矿产公司担任主管。^④

祖马时期的腐败现象从祖马本人频繁更换财政部长这一事件便可见一斑。为了使自己提出的修建核电站的议案获得通过，祖马不仅随

① Joseph Cotterill, "South African Nuclear Deal with Russia Unlawful, Court Rules", *Financial Times*, April 26,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ce7d0fdc-2a7d-11e7-bc4b-5528796fe35c>.

② Mfuneko Toyana & Sujata Rao, "South Africa's Zuma Recalls Gordhan from International Roadshow, Rand Falls", *Reuters*, March 27, 2017, <https://mobile.reuters.com/article/amp/idUSKBN16Y0XM>.

③ Michaela Elsbeth Martin & Hussein Solomon, "Understanding the Phenomenon of 'State Capture' in South Africa", *Southern African Peace and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1, 2016, p. 25.

④ Joseph Cotterill, "South African nuclear deal with Russia unlawful, court rules", *Financial Times*, April 26,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ce7d0fdc-2a7d-11e7-bc4b-5528796fe35c>.

意更换自己的财政部长，任性的使用总统的内阁人事任免权，而且不惜通过玩弄权术在全国制造假象，哄骗大众认知。大约在 2015 年前后，南非经常出现全国性“电荒”，一名开普敦大学经济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在 2017 年 3 月的一次访谈中曾经向笔者讲述：

南非这个国家的基础公共设施建设真是垃圾，前两年政府经常三天两头通知社区居民限时停电，而且是各个社区分时段分别停电，就比如前三个小时是克莱蒙特（Claremont）停电，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就是纽伦兹（Newlands），再然后就是兰德博什。南非以前也是发达国家，没想到基建这么差，这年头还供电不足！^①

而笔者在 2017 年 3 月份对一名在开普敦从事高端住宅买卖的中介代理人的访谈中得知：

南非前两年经常出现全国性“电荒”，实际上这只是祖马在全国人民面前制造的假象。这是祖马背后的一个印度家族为祖马贡献的计策，制造电荒假象是为了使总统提出的“增设核电站”的议案在议会通过，从而使掌握核燃料能源矿产资源的印度家族从中获利。^②

这位代理人口中所说的印度家族指的就是古普塔家族。南非的社会贫富差距极大，正如反对祖马的两位财政部长（奈内和戈登）和许多民主人士所坚持的观点：南非目前所需要的不是斥巨资修建核电

① 资料源于笔者 2017 年 3 月份某日对开普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 Jeff（中国留学生）的访谈。

② 资料源于笔者 2017 年 3 月 20 日 15:00—17:00（当地时间）在开普敦 Rondebosch 一位好友家中对其代理人的访谈。

站，而是解决民生问题。实际上，在广大的贫困农村和城市的贫民窟，导致居民无法用电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供电站的电量不足，而是国家的电线网络还未覆盖到这些穷困地区。南非真正短缺的不是发电站，而是国家电网的普及和覆盖。

可以说，祖马时期南非的国家公共政策制定已然变成了一场充斥着各种“荒诞”的“闹剧”，政治舞台上的“闹剧”背后，起支配力量的是印度人的资本权力。在古普塔家族的资本权力支配之下，国家的公共政策制定俨然已经变成了一种“私人订制”。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资本权力是如何通过族群政治来影响和操控国家权力的。古普塔家族试图俘获的并非祖马个人，而是试图通过祖马建立一个强大且稳固的政治网络，这张政治网络正是古普塔家族俘获南非的利器。在古普塔家族的资本支持下，祖马利用族群纽带和部落效忠编织了一张巨网，为其效忠的祖鲁人政客不仅占据着内阁中大部分关键职位，而且遍布最重要的国有企业部门，甚至一些像自由州一样与古普塔家族利益有密切关系的地方省份，其政府首脑也是由亲祖马人士担任。被资本俘获的国家权力往往通过国有企业和国家政策项目来实现假公济私的目的。比如，1994年后南非政府为了弥补过去非白人群体遭受的不公平政治经济待遇而推动的黑人经济振兴政策（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 BEE）以及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其中包括住房改善计划、社会救助、优惠采购、扶植黑人企业等一系列项目。然而，有关学者的研究显示，在2010至2011年间，国有企业在BEE项目中的支出超过了2000亿兰特，而艾斯康和川斯奈特两家国有企业巨头则占了采购总支出的三分之二。^①可见，一系列旨在促进社会公平、扶植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项目并没有真正惠及底层民众，而是被拥有裙带关系的国有企业所俘获，而这些国有企业大多都与祖马和

① Sanet Madonsela,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State Capture in South Africa", *Insight on Africa*, Vol. 11, No. 1, 2019, p. 118.

古普塔家族有关联。此外，由于南非目前的贫富差距依然主要表现为“黑白”差距，这一方面使得大众仍旧把当下的经济困境普遍推责给历史上的白人权贵，从而忽视了转型过程中新兴权贵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BEE 等优惠扶持政策使得国家权力在实际运作中自然地与族性因素相结合，这不仅为新兴的黑人权贵提供了政策上的便利，同时也是一种肤色上的保护伞。

古普塔家族借助转型时期的各种可乘之机与便利条件，使得自己的资本权力不断凌驾于国家政治权力之上，其对国家公共资源的非法侵占和任意使用日益张扬并且肆无忌惮。最典型的例子便是 2013 年古普塔家族的婚礼事件，一架起飞自印度，载有 217 名婚礼来宾的捷特航空 A330 包机航班降落于南非沃特克鲁夫空军基地（Air Force Base Waterkloof），该婚礼在西北省太阳城（Sun City）举办，为期四天，总花费为 7500 万兰特；婚礼期间，整个太阳城变成了“古普塔城”（Gupta City）。古普塔家族的婚礼事件在南非引起轰动、广为人知，被称为“古普塔门”（Guptagate）和“沃特克鲁夫门”（Waterkloofgate）。^①然而，2017 年，该婚礼被揭露其花费是以自由州的酪农补助计划（Vrede Dairy Project）的名义，由该省政府以洗钱的方式经迪拜汇款给古普塔家族旗下的一家公司。^②时任农业部部长的兹瓦尼批付给古普塔家族一笔名义上用于酪农补助计划的款项，金额高达 2.2 亿兰特。2018 年 1 月，南非国家检察署没收了这笔款项，并称其为“精心设计用以诈取农业部经费之骗局”。^③随着一系列与古普塔

① Pieter-Louis Myburgh, *The Republic of Gupta: A Story of State Capture*, South Africa: Penguin Books, 2017, pp. 115-120.

② “Guptaleaks: The Dubai Laundromat-How Millions Milked from Free State Government Paid for Sun City Wedding”, *News24*, June 30, 2017, <https://www.news24.com/SouthAfrica/News/guptaleaks-the-dubai-laundromat-how-millions-milked-from-free-state-government-paid-for-sun-city-wedding-20170629>.

③ “NPA Freezes R220m, Land Linked to Gupta Farm”, *News24*, January 20, 2018, <https://www.news24.com/news24/southafrica/news/breaking-mpa-freezes-r200m-land-linked-to-gupta-farm-20180120>.

家族有关的腐败案件被爆出，一些学者和媒体记者调侃称，南非是一个被古普塔家族俘获的国家，应该改称“古普塔共和国”。^①

五、宗多委员会：“俘获型国家”的审判与救赎

由于祖马及其内阁的腐败丑闻层出不穷且多与古普塔家族有关联，导致政府机构的公信力在民众心目中急转直下。随后又接连爆发了一系列抗议祖马的全国性游行，而且抗议标语越来越多的显示出民众对古普塔家族控制南非政治的不满，“祖普塔必须下台”（Zupta Must Fall）成为民众抗议游行中的公开口号。^②该口号最早出自反对党经济自由斗士（EFF）的领袖马勒马，2016年2月11日祖马正在议会进行国情咨文演讲时，马勒马公开使用该口号对祖马进行讽刺。“祖普塔”（Zupta）是祖马（Zuma）和古普塔（Gupta）两个词的合成词，以此暗示祖马和古普塔之间的亲密关系。^③最终，在国内民众的抗议声讨中，2018年2月13日，南非执政党非国大正式要求祖马辞职。次日，祖马为了避免遭受国会弹劾和执政党发生分裂，正式宣布辞职。下台后他被控在任内（2009—2018）贪污，面临多达16项罪名指控，而古普塔家族也于2018年2月16日被南非检方正式展开调查。为此，南非最高法院专门责令时任总统（祖马）成立“宗多委员会”（Zondo Commission）对祖马时期与古普塔家族之间有关的“国家俘获”和一系列腐败指控进行调查，委员会由调查法官雷蒙德·宗多（Raymond Zondo）主持，并以他的姓氏命名。

宗多委员会在南非的民主化进程中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它是继

① Pieter-Louis Myburgh, *The Republic of Gupta: A Story of State Capture*, South Africa: Penguin Books, 2017.

② Keith Gottschalk, “War of Attrition Against South Africa’s President ‘Zupta’ is in Full Swing”, *The Conversation*, August 9, 2017,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ar-of-attrition-against-south-africas-president-zupta-is-in-full-swing-82273>.

③ “‘Zupta Must Fall’-and EFF Walks Out”, *News24*, February, 2016, <https://www.news24.com/news24/southafrica/news/zupta-must-fall-and-eff-walks-out-20160211>.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之后，南非人为了拯救和保护南非脆弱的民主免遭破坏的又一次努力。如果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为南非的民主化扫除了种族积怨的历史障碍，那么，“宗多委员会”无疑正在尝试为南非扫除“腐败”和“国家俘获”这些新障碍。正如“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审判与救赎，“宗多委员会”则开创了对“俘获型国家”的审判与救赎之路，其经验和模式值得学习与借鉴。

宗多委员会于2018年1月9日正式宣布成立，经历了委员会组织框架的筹备工作和漫长的证据收集之后，第一场听证会于2018年8月20日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的举行时间为2021年8月12日。在耗时三年之久的取证和庭审工作中，委员会在多达400多天的时间里举行了正式听证会，期间有300多名证人出席作证，听证会上形成的正式记录共计75 099页。整个听证会期间共发出了3171张正式传票，此外，委员会还发出了1380份非正式信息请求。经过上述程序，最终提交并呈现给委员会的证据文件共计1 731 106页。据悉，整个听证会收集的证据中涉及人数约1438人。截至2021年6月，整个委员会工作已耗资超10亿兰特（约6600万美元），所形成的最终报告也已经陆续公开。^①报告的第一部分于2022年1月4日发布，分为三卷：第一卷是关于南非航空及其相关公司的腐败问题，第二卷是与古普塔家族旗下媒体《新时代》（*The New Age*）有关的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腐败调查结果，第三卷是关于南非税务系统和公共采购系统的腐败问题。报告的第二部分于2022年2月1日发布，共两卷，分别公布了委员会对南非国有公司丹尼尔（Denel）和川斯奈特的内部腐败调查结果。第三部分于2022年3月1日发布，共四卷，重点揭露了与私营国有承包商博萨萨（Bosasa）有关的腐败。第四部分于

① Edward Jam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Zondo Commission in South Africa”, *Out-Law Guide*, June 14, 2022, <https://www.pinsentmasons.com/out-law/guides/introduction-the-zondo-commission-south-africa>.

2022年4月29日发布,共四卷,分别对南非的国有电力公司艾斯康的腐败问题、财政部腐败问题、自由州公共住房项目的腐败问题以及国有钻石开采公司阿勒柯斯克尔(Alexkor)的内部腐败问题等进行了公布。报告的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于2022年6月22日由宗多本人提交给了总统拉马福萨,第五部分内容涉及南非广播公司(SABC)、国家安全局、沃特克鲁夫事件和南非客运铁路局的调查;第六部分涉及古普塔公司银行账户的揭露、国家俘获的产生、拉马福萨的证据和非国大在其中的角色以及国会的失察、古普塔家族的资金转移、个体的诉求,以及对所有事件调查的处理建议等。^①

宗多委员会报告公布出来的腐败结果体量惊人。有媒体曾估计,仅在祖马执政的第二个任期内(2014年5月—2018年2月),由“国家俘获”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在1.5万亿兰特左右,相当于掠夺了2018年南非4.9万亿兰特GDP的三分之一,等于剥夺了所有南非人四个月的全部劳动和生产所得;^②由古普塔家族造成的损失总计约490亿兰特。^③然而,拉马福萨曾对宗多直言:“国家俘获带来的全部损失可能永远无法知道。”^④

可以说,宗多委员会为解决南非的“国家俘获”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依然出现了不小的阻力与波澜。尤其在面对前

① *Judici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State Capture Report: Volume 1-6, 2022*; Chairperson: Justice R. M. M. Zondo, Acting Chief Justice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各部分完整报告请查阅官网: <https://www.statecapture.org.za/>。

② Marianne Merten, “State Capture Wipes Out Third of SA’s R4.9-Trillion GDP -Never Mind Lost Trust, Confidence, Opportunity”, *Daily Maverick*, March 1, 2019, <https://www.dailymaverick.co.za/article/2019-03-01-state-capture-wipes-out-third-of-sas-r4-9-trillion-gdp-never-mind-lost-trust-confidence-opportunity/>。

③ Rebecca Davis, “The Total(ish) Cost of the Guptas’ State Capture: R49 157 323 233.68”, *Daily Maverick*, May 24, 2021, <https://www.dailymaverick.co.za/article/2021-05-24-the-totalish-cost-of-the-guptas-state-capture-r49157323233-68/>。

④ Khulekani Magubane, “Wrap: The Full Cost of Capture May Never Be Known, Ramaphosa Tells Zondo”, *Fin 24*, August 13, 2021, <https://www.news24.com/fin24/economy/wrap-the-full-cost-of-capture-may-never-be-known-ramaphosa-tells-zondo-20210813>。

总统祖马的政治余威和古普塔家族的资本权力时，不仅听证会的法律权威受到了挑战，而且还引起了一场“三十年未有”之暴乱。在整个听证会环节，面对宗多委员会的指控和传票，祖马曾多次以健康和新冠疫情为由拒绝出庭。2020年11月，祖马在一次听证会上无视法庭，在没有得到大法官宗多许可的情况下直接离席，此举随后被判“藐视法庭罪”，并要求祖马入狱。面对牢狱之灾和“俘获国家”罪行的审判，祖马曾在2021年7月4日入狱前在其家乡用祖鲁语对其拥护者进行演讲，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声援祖马的抗议。抗议活动随后在夸祖鲁-纳塔尔省和豪登省演变为一场持续数日的暴乱，这场暴乱被视为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后最严重的一次暴力事件，造成的损失极其严重。而根据南非媒体《独行者日报》(*Daily Maverick*)的透露，这场暴乱实际上出于前总统祖马与包括国家安全局情报人员在内的十多名好友的精心策划。^①与祖马利用自己的政治余威和族群身份的抵抗策略不同，古普塔家族更是在祖马被迫辞职之际便迅速逃往海外，藏身迪拜。

六、总结与反思：后殖民国家的转型困境与前景

南非的“国家俘获”案例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种困境：新兴民主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刚刚摆脱了利维坦式的“强国家”困境，却又很快陷入了一种被资本绑架的“弱国家”困境；同时，由于后殖民的社会背景，导致这种“弱国家”困境与族群政治深深地绑定在一起，从而大大增加了对其发现和治理的难度。

国家俘获现象属于民主转型过程中滋生出来的权力腐败问题，资本权力的逻辑是理解这一议题的核心。然而，资本权力在南非之所以

^① Ferial Haffajee, “Under Investigation: Twelve Masterminds Planned and Executed Insurrection on Social Media, Then Lost Control After Looting Spree”, *Daily Maverick*, July 14, 2021, <https://www.dailymaverick.co.za/article/2021-07-14-under-investigation-twelve-masterminds-planned-and-executed-insurrection-on-social-media-then-lost-control-after-looting-spree/>.

能够野蛮生长，并导致对国家权力的俘获，背后既与新自由主义为其大开便利之门有关，同时也离不开族群身份这层保护伞。后殖民国家如何走出资本权力和族群政治绑架新生民主的双重困境？这既要求我们对新自由主义有所审视，也需要我们对民族主义乃至民族国家体制进行再反思。

近年来，由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带来的国家能力疲软问题日益突出，不少左翼学者开始重新提倡“国家学派”的主张，呼唤国家的回归，号召“把国家带回来”。^①一时间，米格代尔的“强社会与弱国家”理论开始流行，^②并被奉为分析“弱国家”和“失败国家”案例的理论圭臬。然而，“国家俘获”理论所揭示出来的资本权力这一逻辑视角，对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的二元对立视角构成了理论上的冲击。从南非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导致“弱国家”出现的原因不是“强社会”，而是“强资本”。如果把津巴布韦的案例和南非的案例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正是由于穆加贝奉行的“强国家”逻辑导致了白人资本的集体流失，才使津巴布韦走向了“失败国家”。所以，国家能力的强弱并不完全取决于社会能力的强弱，两者之间也并非零和博弈的关系。南非和津巴布韦的比较让我们看到，国家能力实际上与资本之间存在着莫大的关系。国家能力的提升既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又不能为资本所挟持。在笔者看来，解决“弱国家”困境的关键不在于削弱社会，而在于维持国家、资本和社会之间的三元平衡。这是一种更为宏观的三权分立与制衡，若从民主化的价值归宿进行考量，需要警惕和制衡的恰恰是国家权力和资本权力，社会权力不仅是对二者有效制衡的保障，同时也是民主社会的价值体现。因此，面对“弱国家”和“国家俘获”等困境，我们需要打破“国家-社会”二元

①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② 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对立的固化思维，重新建立一种“国家-资本-社会”的三元平衡理念。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结论应该是福柯式的“必须保卫社会”，而非重回“强国家与弱社会”的老路，其经验教训已经有史可寻。真正健康的民主应该是不断探索“强国家与强社会”的可能，而非把国家与社会看作对立物。

南非的“国家俘获”案例中已经充分体现了学术界与媒体在社会中的中坚力量，南非的公民意识和社会权利意识在此次事件中也得到了充分加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和“宗多委员会”的一次次创举说明了南非在国家转型道路上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决心。至于其中暴露出来的族群政治问题，不仅与南非族群和解工作的深入程度有关，而且也和整个民族主义时代背景下的民族国家体制有关。如何解决这一难题，需要进一步的专门研究。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对于“资本权力”和“族群政治”两大难题，南非人都已经做出了巨大努力，并且总结出了宝贵经验。相信南非人在秉持正义的精神下，通过不懈努力，其民主转型终将迎来光明的前景，其经验模式也将服务于更多共同命运的后殖民国家。

（责任编辑：丁辰熹）

**Capital Power and Ethnic Politics:
The Formative Logic of State Capture in South Africa**

—— The Gupta Family in Zuma Era as a Case Study

Zhu Pengfei Yang Chongsheng

Abstract: State capture is a common transition dilemma in Emerging Democracies. It is essentially the kidnapping and manipulation of state power by the power of capital and is a high form of corruption.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the dilemma of state capture was also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The case of South Africa is marked by ethnic politics due to its colonial history and the Apartheid system. The entanglement of “capital power” and “ethnic politics” makes the situation of “state capture” in post-colonial countries even more complex.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the phenomenon of “state capture” in South Africa, and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Gupta family and Zondo Commission, we attempt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and solution of “state capture” in post-colonial context. Ultimately, it is hoped that the case study of South Africa will provide a theoretical complement and refinement to “state capture” and attempt to form a dialogue with the larger theory of the “weak state dilemma”. In this way, we hope to reflect on the path of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in post-colonial countries.

Keywords: South Africa, State Capture, Capital Power, Gupta Family, Zondo Commission